

■新作聚焦

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

“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

□李浩

《有生》有着相对宽漫的时间跨度,小说中的“祖奶”和其中的众生经历着百年时光里的全部曲折、疼痛、起伏、爱欲和时代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个人命运与社会认知的转变。小说貌似书写个人和个人史,但它更为内在和险绝的是胡学文的“野心”,他野心勃勃地试图借用《有生》勾勒他看到的、体味的、认知的时代面貌和命运面影,试图让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体验和体验的总结,都“经历过沧桑”。“祖奶”是一个具有寓言式的象征,而她接生婆的身份也是寓言化的,它意味着生殖、延脉、新生,也意味未知、到来和慢慢彰显的力量。依借这一身份和能力,“祖奶”获得了生存的微弱保障,是她得以历经百年、在种种波澜和波折中得以活下来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依借这一身份和能力,她得以进入到各家的生活和历程中,接触到人世间的百态和各色人等,接触到他们的生活和内心。

就小说的写作而言,想到是一回事,将它完成并充分地完成又是另一回事,它考验着作家的智慧、耐心、设计和才能。就《有生》而言,胡学文在这一向度上的展现是成功的,让我们看到了丰富、多样和内在深刻。和“百科全书”的宽宏相称,《有生》几乎可算做乡村版“清明上河图”,所有在乡村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在这部阔大的书中都可寻见影子,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件几乎都可在这里寻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爱与哀愁、痛苦与欢愉,他们心底的种种计较和掂量,他们的在意和装作不在意,他们的固执、冲动、善良、奸佞、虚荣、忐忑、怯懦和欲盖弥彰的欲念,都在其中有所展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生》也算是农村人性百态的“百科全书”式图谱,与之相匹配的是书中所展示的胡学文写作中博物志的理想、风物志的理想,以及民俗志的理想,胡学文巧妙地将它们一一揉碎,散落于小说的叙事中,和小说故事水乳交融。在这里,我也必须赞叹胡学文讲故事的能力,那么多丰富、极有弥散性和掩饰性的人性微点不仅被他一一捕捉,更是在他的粹取、分解、凝结和融合之后,交给有限的几个人来承担,这显示了小说家的笔力。小说中,作为核心出场的人物并不多,祖奶是最重、最被强化的一个,其他的人物与其构成了时间之网、命运之网,他们都携带着自我故事

的连线,他们彼此连接、相互纠缠。于是,这张有着强烈的严密性和环扣众多的蛛网得以更大程度地延展,几乎望不到头。

以乡村为支点,以熟悉的生活和这种生活的提供为支点,胡学文削繁就简,同时添枝加叶。削繁是为了让故事和命运的精彩更为集中有效地呈现,而添加枝叶则是让故事产生更为微妙的丰富性,让它更能有“总谱”的阔大复杂,更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小说中,胡学文建筑起庞大的喧哗,这喧哗极有复调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也是以“体验”为基础的,“体验”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词:所有的人与事物都围绕着“体验”来书写,他们一一伸出了自己的感受神经,与那头“时代之兽”发生触碰、摩擦、充分尊重甚至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的每个人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的意志。其难度巨大,是因为每个人物的主体性会大大地冲撞和破坏小说的整体感,很容易成为按照“个人意志”各自奔跑的骏马而不顾他们共同的马车。事实上,小说往往会对生活说“不”,它不等同于生活,也不会将生活的种种碎屑全部纳入而不加修减。为了“整体性”,胡学文削减了人物,他做大做强了故事中“祖奶”的声音和体验,其他的人物在她身侧多少会形成环绕感,这样当然就强化了凝聚。碎片拼贴的方式也有意地配合于小说的整体性,他不让某个人的故事在叙述中太过突出而夺去“祖奶”的光,形成分流,时空的不断穿梭、闪回和交织也是有益于小说整体性的,这样的手段可以不断地让每个人的故事与“祖奶”的故事、“祖奶”的今日发生联系,让向心的线始终在着并且时不时提示一下。

与此同时,在此浩大繁复的《有生》之中,我们会发现胡学文多少克制了自己的细节描写能力,他少有缜密、复拓的铺陈,这当然也是为了整体性而做出的取舍,他充分地、创造性地使用着“道具”:一只不断在窜的蚂蚁。胡学文让它始终存在着,从小说的开头“窜”到小说的结尾,它成为另一条可见的、夯实的串连之线,让整体性更为明晰。这是作家的缜密心思,是他在“危险”和不断的“危险”中建立起的平衡,它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我猜测,胡学文之所以如此,是他对“体验”的看重,他应是



认为理论(或思辨的意识)是灰色的,而真切真诚的体验之树长青,那些来自生活体验的感受应更具生命力,当一种理论(或思辨的意识)经年之后变成常识或被证伪,它的价值就会遭受减损,而来自生活的真切体验、情节与细节则能有效避免这一减损,只要它是活的、丰富的,能联接人类共同情感的,那它就可以不断地被丰富、被重新注入“新意”,就像希腊神话里的那些故事,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些故事。必须承认,小说里面那些真切的、具有气息和意味的情节细节经得起时间的磨损,它总会在某些时刻重新被唤醒,重新焕发出新意之光。另外,“体验”是浑浊的,它不具备明晰的、单一的阐释向度,而恰因这一点它有了更强的、更丰富的容纳,对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也是一种唤醒,它呼唤参与并让你与之“叠加”,构成文本的多重。

百年的生活变迁、风起云涌,有着太多的巨变和壮阔波澜,然而它也是被反复地言说和书写的一段历史,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提供着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刻认知,它们自然而然、或重或轻地影响着胡学文。胡学文当然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他也愿意更多地发挥作家的长处而不是短处,有意让这份长处发挥到极致,他要成为

“人类的神经末梢”,将那些大得不得了的历史、时代、命运和它们的给予变成个人感受,让个人来承担、负载和触动。

胡学文注意到时间和时代之变,注意到这变所带来的变动,注意到它对人生、人性的深入影响,但他更为看重的却是某种不变,是那些不因时间和时代之变而轻易改变的东西,是那种可能、可贵和可怕的恒定,是人和人生中的种种相遇。

■创作谈

2020年初,我修改完《有生》最后一章,内心涌起难以言说的甜蜜,但同时又怅然若失。这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终于完成,当然如饮甘露。每个作者都体味过这种快乐。但想到即将挥别陪伴了我一千多个日夜、我视为亲人的人,又特别失落。回想写作时的魂牵梦萦,格外难受。这不是矫情,确实是真实的感受。写他们的命运,写他们和世界的关系时,我惊讶地发现,我对世界、对万物的看法和感知竟然发生了改变。某年的6月,我到山西翼城,随友人爬历山。历山风景很美,但让我着迷的是历山上体形硕大的鸟鸦,彼时的鸟鸦是另一个人,承载着如花的情感,影响着如花的命运。错落的黑影牵引着我的目光,从未有过的亲切。某个冬日,我去小区对面的公园晨练。我习惯早起,天色尚朦胧,缺月挂在西天。公园里没有别人,只有我的脚步。人月两不厌,我忽想起罗包在月下行走的感觉。那一章已经完成,但罗包的感觉仍在。那一刻,我成了罗包,拥有了罗包的爱情和忧伤。回老家的途中,看到杨树杈上密密麻麻的喜鹊窝,我总要放慢车速,生怕惊扰了喜鹊的美梦。那曾是我熟视无睹的风景,但因为写这部小说,它或者它们与过去不一样了。五光十色,令我眩神迷。

还有许多,这一切全是由《有生》所赐。在写作之初,我并未想到,那是意外的惊喜。写作者塑造人物,人物也在塑造写作者。

短篇小说可以电光石火,可以捕捉,而长篇是建造式的,须有整体设计和构思。《有生》这部长篇从搜集资料至动笔写作,准备时间数年之久,在我的整个写作生涯中,确实是创纪录的。

小说的题目来自《天演论》:“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在结构上,我采用的是伞状结构,以核心人物为伞柄,另外五个叙述者为伞骨。我一直想写一部百年家族式的小说,但此类小说太多了,所以我想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不同于通常所见的家族小说,也不同于直面现实的小说。也许有些怪异,但这样的构思让我兴奋。

在叙述上,我最早写的是这样的句子:“虽然我躺在黄土深处,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但后来看到太多小说由鬼魅叙述,呈泛滥之势,遂放弃。小说中的祖奶是百岁之人,如果让她坐着讲述倒也可以,但又觉得太容易偷懒了。思索许久,改用现在的方式,祖奶奶不会说不会动,但她耳朵灵敏。小说写了祖奶奶4月的一个白天和5月的一个夜晚,以她的叙述为轴。祖奶奶是接生婆,共接生一万两千余人,另外五个人物皆是祖奶奶接生,当然祖奶奶与他们的关系不是接生与被接生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小说之魂。近年来,我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读后发现今生的许多现象在历史长河中皆有迹可循,甚至是复制翻版。我们与父辈及祖先确有不同,但先祖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仍要面对,比如生死,比如欲望,比如哀伤。我原想直奔主题,使小说有足够的硬度,啃起来吃力一些,但反复推演后,决定还是从软处落笔。

我尊敬的一位作家说过,小说写的是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我奉为主臬。好的小说不是阐释了什么,而是提供可供阐释的空间。这个空间只有柔软的路径可以抵达,个人认为,当然,是否抵达,还需评论家和读者评判。

《有生》之赐

□胡学文

■短评

涸辙之鱼 相濡以沫

——陈旭红《白莲浦》叙事原型及其情感方式

□张吉兵

涸辙之鱼 相濡以沫

陈旭红小说《白莲浦》的叙事原型借用《庄子·外物》《庄子·大宗师》两则寓言概括为“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她的一些作品如《白莲浦》《幽幽茶花》《水月庵》的背景是传统宗法制乡村社会。白莲浦(《白莲浦》),陈仕富湾(《亲和酒》),思富湾(《思富湾》),叶家麻、刘家冲、万家店(《水月庵》)等等,都是些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传统伦理道德维系着乡村生活,充满人间欢乐的气息,人们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鳏寡孤独皆所养。

还有些作品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如《那对美丽的云青坛》《亲和酒》《思富湾》。《那对美丽的云青坛》写的是南门矶两对夫妻离开土地、改变世代谋生方式,分别来到镇上和县城创业,通过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寓写了乡村社会传统的发生改观的趋势。《亲和酒》是一首传统乡村社会没落的挽歌,世道人心不知不觉间发生改变,邻里之间人情在变薄,乡亲之间出现隔阂,令人怅惘却也无可奈何。《思富湾》叙述思富湾村落一群小伙、姑娘外出闯荡,在北京打工的遭遇,乡村耕作劳动方式已经不能维持生存需要,所以乡村青年人必须到大城市去打工,然而他们身上乡村的局限性制约着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都市社会。陈旭红叙写了受市场经济波及影响的乡村,抒发了她对传统的流连,表达了传统乡村没落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陈旭红的本意所在不是叙写传统乡村没落,而是抒写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情义。老一辈的“我娘”白莲用她的怀抱哺育了两个从出生就被遗弃的孤儿“我”和细骚儿,年轻一辈的清芬同样以她的情怀翼护思富湾陈氏宗族的一众兄弟姊妹。少儒老人年轻时为了拉扯弟兄长大成人,承担着长兄如父的角色,耽误了娶妻生子成家,最终孤老一生,晚年寄居水月庵的一间厢房,收养了非亲非故、天生痴傻的孤儿“友忠儿”,恩同再造般关爱体弱多病的“我”。这些鳏寡孤独的乡村社会女人、老人,都是自顾不暇的人,却又是如孟子所称的那种自己尚处冷冻却把衣食馈赠与他人的人。互相温暖不仅是一种情感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这些慈爱的老人、善良的女人,在温暖、关爱别人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生命因此有所寄托,情感有处安放,他们赢得乡亲的敬重,当“我娘”白莲、少儒老人、蒙古大爹去世,临终关怀成为家族慎终追远的仪式。人们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

分,并没有真的孤独者,“我娘”(包括少儒老人、蒙古大爹、清芬)式的根源在于同情之心的互相温暖,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相互温暖其实是在传承一种文化。这是陈旭红小说“温暖写作”“善良写作”的意义所在。

只是任何美德和善举终究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如同相濡以沫不能阻止涸辙中的水蒸发,直至完全干涸。然而这是否否定或取消美德和善举的意义,相反,涸辙犹如下在美德善举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者的紧张关系,让这种泛伦理情怀的爱愈发揪紧读者的心。

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陈旭红以她悲悯的情感方式否定了这下句。《思富湾》中清芬因祸得福,在江主任的帮助下在贸易城开了一个做皮制品生意的店铺,境况看好,同村一起出来打工的春风得意兄弟、丰收丰产兄弟及其他同乡仍然处于混的状态,他们对清芬构成潜在的威胁,江主任劝清芬与他们保持距离,以规避可能的风险,这就是大家相忘于江湖。但清芬不假思索地回绝了江主任的善意。她的笔墨全部集中在表现这些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相与”(友爱)。

陈旭红悲悯的情感体验中传统文化的侵染很重,感性色彩浓厚。陈旭红以特定乡土情境中的乡土人物群体之一员的身份,叙述自己和大家的生活事件、人生、命运。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各种不可知的外在事物和力量都足以影响、决定、制约人的生活和命运,陈旭红把乡土社会的意识认同为自己的观念,并构成她“悲悯”的叙事基调。她的小说就是用悲悯的笔叙写乡土社会中的爱、善行。

这种悲悯构成对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宿命的抗拒。陈旭红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仁慈的老人抑或善良的女人,没有一个好命,有中年丧偶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身陷牢狱的、被遗弃的、孤老终身的、遇人不淑被抛弃的、身罹绝症的、自尽的……这些悲剧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性格的,而是命运的。虽然陈旭红吝惜于给她的人物一个明媚的人生,但她却怀着悲悯心善待每一个不幸的灵魂。她以一支纤笔写出生而为人的高贵,他们没有被命运摧毁,而是自助动人,互相温暖,显示出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的顽强生命力。

■新作快评 陈佳勇《蜗角虚名》,《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4期

“成长”、“拒绝成长”与“反成长”的汇合

□战玉冰

现如今一般的商场题材小说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着力表现不同利益集团或职场个体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变权谋,或可以名曰“当代职场宫斗戏”与“当代商场三国杀”;另一类是以“成长”为叙事框架来讲述男女主人公在职场、商场中不断遭遇挑战,以及在克服挑战过程中的晋升与自我成长的故事。后一类小说通常可以与修仙玄幻小说中的“打怪升级”故事视为同一叙事套路下的不同时空背景想象,它们都体现了当代大众阅读语境中的心理期待和阅读快感。

陈佳勇的小说《蜗角虚名》粗看之下,似乎与第二类职场成长小说比较接近,《蜗角虚名》的确是以主人公林子昂从京华大学毕业后进入振华控股实习、工作、晋升、发展这8年来的职场经历为主要叙事线索,在叙事视角上也几乎是围绕林子昂的所见所闻所为来展开故事的。但《蜗角虚名》与一般的职场成长小说的不同在于,主人公林子昂出身名校,从中文系毕业后进入金融圈,小说很多时候努力凸显的是其“跨界”学习与社会经验积累的一面,而非一般职场成长小说中对职务提升与欲望膨胀的聚焦。《蜗角虚名》更重视林子昂“所见”而非其“所为”,并在这个意义上有些接近于巴赫金所说的“漫游小说”。

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小说主人公林子昂在外在物质光环不断增加的同时,其内心却体现出一种不曾与外在光环随波逐流的、近乎于“拒绝成长”的单纯和坚持。比如小说多次正面描写

林子昂内心的自我反思。而且小说中林子昂除了有老板兼人生导师杜铁林作为学习目标之外,还有知名学者王儒瑶和班主任安可为所代表的精神世界的另外另一个层面,这两种精神面相可以简单概括为“商场规则”与“文人本色”,林子昂正是在不断适应并融入“商场规则”的同时在有意无意地坚持着自己的“文人本色”,或者说他是在这两者精神取向之间不断撕扯,进而获得一种内心的复杂和精神的张力。林子昂在外在物质生活不断“成长”的同时又某种程度上坚持了自己内心的“拒绝成长”,小说《蜗角虚名》也由此完成了在一个职场成长小说的框架下,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成长本身的拒绝和反抗。

在林子昂身上,成长与拒绝成长悖谬式地并存且相互拉扯,同时,小说还借助杜铁林与林子昂之间的镜像关系

将所谓职场成长或商场神话进一步复杂化和现实化。不难看出,林子昂与杜铁林其实可以视为是一个人不同成长阶段的化身,这也是为什么杜铁林对林子昂格外倚重甚至情有独钟的潜在原因。在精神层面上,杜铁林除了一在商场规则中施展拳脚、取得成功之外,也同样有着林子昂“文人本色”的一面,这集中表现为杜铁林视王儒瑶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并在王儒瑶去世后感叹“我现在彻底是一个没父亲的人了”。而当我们把杜铁林作为另一个人生阶段上的林子昂来看待时,就会看出小说反成长的潜在主题。纵使杜铁林有着绝对过的头脑、强大的气场、锐利的眼光、冷静的决断和广博的人脉,纵使他能够躲过股灾如熔断,也必将毁灭于自身的“欲壑难填”。更多的资金“子弹”、更大的话语权、信托牌照的无限诱惑,最终造成了“老板不见了”这样一个小说必然而至的结局。小说也借着杜铁林的镜像照射出林子昂未来的成长,他大抵会如于连、拉斯蒂涅和包法利夫人一样遭受到成长的幻灭。而林子昂现阶段虽然仍在成长(商业规则)与拒绝成长(文人本色)间纠缠,但随着商业规则洪流的势不可挡,其未来或许仍难逃和杜铁林一样的反成长的失败结局。当然,小说止步于杜铁林的消失,而对林子昂的未来采取了留白的态度,并由此将问题悬置。杜铁林的前车之鉴能否成为惊醒或改变林子昂人生轨迹的警钟?这是小说留给每一位读者乃至作者自己的问题。

小说《蜗角虚名》除了对林子昂与杜铁林的成长、拒绝成长与反成长的着力表现之外,对很多配角人物与不同现代都市的描写也可圈可点。从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物(学者王儒瑶、“青椒”安可为、演员姚婷婷),到形形色色的各式老板(董建国、鲁光辉、孔老三、六哥、K总),再到性格迥异的现代城市(北京、上海、杭州、香港、澳门)。《蜗角虚名》在围绕林子昂和杜铁林而展开的成长与反成长主线故事之外,同时勾连出的老板群像、社会百态与丰沛淋漓的现实汁水,使得整部小说在商场故事之外,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现实感与丰富性。